

■新作聚焦

## 龙一长篇小说《接头》：

## 当英雄遭遇困顿

□梁康伟

龙一的新作《接头》企图探讨的是“英雄的困境”，联系他之前的作品，被动、失控，似乎才是龙一想要再现的生活真实。在此，龙一无意间已经触及了英雄在当代生活中的命运。

以往的英雄形象哪怕是在最大的逆境中，大概也没有体验过上述失败感。而失败感，正是最深刻的现代感受之一。当英雄作为普通人的当代境遇成为文学处理的对象的时候，也许，我和我的英雄才真正站在了平等的位置上。

怀抱“英雄梦”的龙一写过一部意味深长的中篇小说——《没有英雄的日子》，讲述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行动。尽管他并非完美的英雄，却着实立下过功勋。小说并不止于此，而是穿插了1950年天津市镇反干部关于他当年身份的审讯记录——曾经的英雄、历史的创造者，现在却要反过来接受它的审查了。回望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历史，共和国的英雄们多少都经受过这样尴尬的境遇。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另一种“英雄”正在被虚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大全”人物，这种英雄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神坛上走下来，还原为人。毕竟英雄也是人，有弱点、有缺陷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

谍战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化相对比较明显的形式，大概都离不开塑造英雄人物。一方面，它要面对如何在结构上自我突破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以小说的形式处

理当下现实的问题。就前者来说，以反崇高、反英雄的方式作为自我突破的策略，也许是一个由来已久又自然而然的道理。龙一的创作放在谍战小说类型的序列里，大概也属这种情况。他的小说《潜伏》《长征食谱》《在传说中等待》《没有英雄的日子》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有的都是并不完美的小人物。新作《接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的主人公关大宁不但是个普通人，而且是一个携带诸多“花花公子”不良习性的另类人物，用他的接头人老杨的话说，他“最大的本领就是把生活和工作搞得一团糟”，常常把上级也弄得无可奈何，简直不太配得上英雄所应有的人格。当然，龙一依然是在塑造英雄，寻找一种非典型却更真实的英雄。

龙一的抱负可能还不止于此。他在某处说得很明白：“我有意识地关注那些英雄内心之中的困境，关注他们生活当中的困境，关注那些被从传统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中有意剔除掉的、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对人们影响深刻的内容。简单些说，我试图再现生活。”这是一个严肃作家的抱负，但是用谍战/历史小说来完成这个任务似乎不讨巧，因为类型文学多少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需要遵循一个外部的架构，比如对组织的无条件服从，信仰具有绝对约束力，这个组织无需正面出现，信仰也无需加以说明，这些都是不证自明的，“服从”是小说模式本身天然决定的。每一次“接头”都会衍生新一轮的较量，较量的过程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体。而主人公无论历经多少曲折，最终胜利都属于他们，鲜有例外。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信仰、忠诚，以及是否胜利的结局，都成了形式或符号，只不过是外在的框架，没有太多讨论的余地。小说家真正可以大展身手，或者说真正考验其写作水准的地方，只在这个框架内，即如何处理人物完成某个使命的过程。

这样一来，龙一就有机会施展他的抱负，把英雄的生活、精神困境置入他拿手的谍战/历史小说框架内。如此来考察《接头》，我们大可不必追问这样一个尚未完成改造的富家子弟是否真的会忍受地下工作的种种折磨，也不必把他最终依然逢凶化吉并且为革命事业收集到无数情报的结局放在心上——当然这都是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必要条件。在关大宁身上并没有那种对他的运筹帷幄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感觉，我们会发现，英雄也会无助、自嘲。

每每关大宁面临道德考验时，与其说抽象的信仰帮他

渡过了难关，不如说伦理、良心上的责任来得更可靠一些——他需要保证心爱的女人谭美、不知情的母亲、作为情报来源的中统局天津站站长梁公肃、精神失常的线人黄若愚、同志兼假妻子刘淑娴、另一位同志即淑娴的真丈夫陈正泰及二人的儿子黄福生等人的安全，事实上，这些人的糟糕处境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他的不負責任和自以为是造成的，因而他又时时处在自责的状态中，随时寻找补救的机会，结果却越救越乱。作为谍报人员，关大宁并非总是步步为营，反而常常发现局势超出了掌控范围，甚至落入对手的圈套，自己和上述人等的生活被搅成一团乱麻、结构关系错综复杂是小说的一大特点，龙一极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叙述之能事，小说之曲折交错无以复加，直到最后所有人物之间的关系都几乎被重组，生活最终被送上了无可逆转的悲剧境地。以至于关大宁常常叫苦不迭：“我只觉得我这个革命者活得太难了，这日子简直是没法过”——活脱脱一个革命失败者的形象。

当然，框架层面上的革命事业在他们的牺牲之下最终胜利了，主人公也获得了人格上的升华，他总是在一片措手不及与手忙脚乱中化险为夷，但是过程中的混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毕竟，生活的实感比预设的结局要真实得多。

联系龙一企图探讨的“英雄的困境”的说法，被动、失控，是否才是龙一想要再现的生活真实？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接头》这里也适用的话，是否可以说法龙一无意间已经触及了英雄在当代生活中的命运？从《没有英雄的日子》里被镇压的英雄在政治面前的颜面扫地和疲于奔命，到“高大全”的虚拟英雄，再到新时期“反英雄”的英雄，我们的英雄走到当下，是否也要面对庸常生活的围剿？以往的英雄形象哪怕是在最大的逆境中，大概也没有体验过上述失败感。而失败感，正是最深刻的现代感受之一。当他闯进当下社会——这个不但没有英雄，也没有了敌人的无物之阵，得到的只可能是失败。当英雄作为普通人的当代境遇成为文学处理的对象的时候，也许，我和我的英雄才真正站在了平等的位置上。

当然，作为一部依然典型的谍战小说，《接头》大概还没有走得那么远，它甚至可能是为了追求节奏上的明快、人物关系的复杂，有时并没能来得及对人物做更为深入的挖掘。无论如何，类型化的小说如果想真正走出自我重复的困境，上述思考或许会是一种启发。

## 拥抱最后的乡土

——读胡永良散文集《从篱笆到围墙》 □江子

障。”而那一堵围墙正是那些外出打工回来的村民、作者的兄弟姐妹们用自己的双手砌起来的。

林溪的土地被开发区征用，胡永良原本抒情的书写开始变得冷静。他记录下林溪村被工业化的进程：“东面与西面的土地征去了”，“西面与南面那大片的水田被征去”，“一幢幢七层的农民安置房矗立在原来的油茶林地上。小区内，水泥路面四通八达，虽然过高的容积率使安置小区拥挤不堪，但看上去也算规整、现代，像城区一样”……村子的改变带来了人的改变，人们开始为拆迁款而争吵。祖父的旧文化无人继承，许多人成了工业区的工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到丧失故乡的不适。

疼痛开始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潮流不可逆转，大量的农民要成为市民，大量的田地要被征用。然而我们依然需要胡永良的文字。他前面的抒情并不是撒娇，而是一个痛失亲人的对往事的倾诉。这样的赤子的倾诉，在温情主义、缺钙的文字大量堆砌的当下，有着对道义的肩负和对现实的批判勇气，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胡永良是江西人。江西自古以农耕文明发达，乡村文化体系相对完备，江西或者江西籍的写作者因为从

■短评

读胡永良的散文集《从篱笆到围墙》——一个村庄被“现代化”的背影，开始时我以为作者准备的是一根叫做乡愁的绣花针。他不断地写自己多年前在故乡——赣西地区一个叫林溪的村庄生活的感受。他写故乡橘园里的的气味，写少年时昼午在村子里游荡的感觉，写农具、写棉花。我承认他写得有些矫情，仿佛一个阔着的人在压着嗓子说起自己的艰辛往事，或者一个老大不小的人以少年姿态扭捏着躺在母亲怀里。如果全书都是这类文字，它不会让我感动。

然而《从篱笆到围墙》不仅仅是为了表达乡愁。林溪的地理历史、风光伦理在胡永良的笔下逐渐呈现开来。它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村庄中的一个，既有着美丽的风景，也有着劳作的艰辛和命运的沉重。当然，它和中国几乎所有的乡村一样，有着一张与苦难的中国历史相得益彰的沧桑的脸庞。胡永良还写到了2006年，村庄遭遇了一场空间与伦理的撕裂。2006年他的故乡林溪俨然乱世：“村北，推土机突突地昼夜不歇，将新鲜松软的黄土堆得山高……村南，一堵高大的围墙绵延数百米，严严实实地截住了村庄与工业园区神圣不可逾越的屏

## 文学批评中的“寻美”历程

——读李德南批评集《途中之镜》 □廖令鹏

如果一个批评家立志于以批评事业，那么他必须尽早开辟批评的疆域，在那里与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互联互通，用心经营。李德南新近出版的批评集《途中之镜》让人看到了这位“80后”批评家为文学评论的开辟所作出的付出和积累。

李德南充满批评的热情，他主持《创作与评论》杂志“80后文学大展”（后更名为“新锐”）和“对话70后”两大栏目，陆续把有实力有代表性的“70后”、“80后”作家纳入批评实践当中，推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及作品。除了热情，他还有批评的激情，与王威廉、周明全、陈劲松等青年批评家和作家对话时，批评影响的焦虑被抛诸脑后，年轻飞扬的心灵交相辉映，纵横中外的妙论起伏澎湃，形成了《代际视野下的“80后”文学》《在现实面前，文学化的抒情是无能的》《在通往批评与写作的途中》等神采奕奕的文章，展现了一个意气风发、激情四射的批评家风采。

李德南有着广阔的历史视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经验与可能性》——以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为例》这篇文章当中，他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几大脉络，分析了其中的理论源流，道出了其中的未尽之意。《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实践和想象》一文，李德南

■创作谈

除去宗教，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承认与否，多多少少都会“信”点什么。信什么呢？有人相信“世界和平”，这个无法争论；有人相信“钱”，这个可以探讨；有人相信“性本善”，也有人相信“性本恶”，这都是经典，早有结论，虽不充分，然不远矣。作为一个以讲故事谋生的人，我相信什么？如果说我相信“吃饱了不饿，睡醒了不困”，这是常识，近似于宇宙普遍真理，说了等于没说。其实，从职业的角度来讲，我相信“文字缝隙”。

举个例子，中国有个在全世界都很著名的故事《赵氏孤儿》，在国内有京评梆、电影、话剧等艺术形式的改编，国外有法国伏尔泰1735年改编的《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和英国威廉·赫察特改编的《中国孤儿》，然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故事的改编者都对主人公程婴最后自杀这项重要内容不够重视。程婴帮助赵武复仇、复国成功，却选择了自杀，这一点正是这个故事核心的精髓。这一精髓的真相在史书上并没有文字记载，只有程婴自己言说的自杀理由：“我将下报赵宣孟（赵朔）与公孙杵臼和‘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我以为，这里恰好体现了我所谓的“文字缝隙”。

古代评价“士”的价值标准之一是“高洁”。程婴能行“义举”，同时也深通人情世故，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功成之后，他的身份就从一个奋不顾身的“义士”下降为投资获利之人。程婴若想防止世俗之人和后代史家对他的种种揣测，让自己的“义士”身份不被卑俗之论玷污，他就只有自杀这一条路可走。而支持他自杀的道德动机就是“洁”，他必须得将自己与这不世之功产生的任何利益割断，从义士和功臣回归到“友”的身份。

由此便进入程婴更深层的动机，公孙杵臼当初誓愿程婴“胡不死”，是因为程婴当时作为“友”确实“应该死”。对于“高洁之士”来讲，程婴辅佐赵武20年，不论是功劳与苦劳，都无法与他当年的“应该死”相抵，因为这完全是两回事，不存在等价交换或功过相抵的可能。于是，程婴主动忽略“功劳”，回归“胡不死”的本初理由，选择用自杀以“自洁”。所谓“死义”，程婴在整个事件中自觉主动，细致周全地做出了近乎完美的诠释，这也就是这个故事的伟大之处。

我是个“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在家深入生活，从“文字缝隙”中去发现被删减、被修改、被编造、被忽略的内容，将其拼凑、缝补、还原，基于这些发现，再从中提炼出代表性人物和独特的故事结构，然后结合我个人有限的知识和对人情事理的积累，这才形成小说作品。

《接头》这部小说就是这样完成的。我在小说中有意减少了对主人公具体工作的描写，尽管这类内容会很惊险有趣，能更多地吸引读者，但它不是这部小说的写作目的。我在这里想要做的，是试图发现和复原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生活困境”，特别是他在伦理上不得不经受的多重考验与折磨。这些生活困境反映到具体某位同志身上也许内容没有这么丰富，但作为文学作品，我有责任让“这个人物”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隐喻性，不如此，真的就对不起那些勇敢、高洁的人们；不如此，“这个人物”甚至不像那个时代的英雄。

■新作快评

朱强散文《行砖小史》  
《人民文学》2015年第5期

## 从「墟土」到「行砖小史」

□曹宇远

出生于1989年的朱强以奇异的想象、现实与历史交错并行的结构、深得古典情味的诗性语言和对时空的个性理解，向人们展现出一道新鲜的风景。他的新作《行砖小史》现实与历史交错、诗意跳跃，极具动态感和丰富性。

想象、暗喻伴随严格的历史考据，多线交错，构成了一个奇妙而精微的复合文体。在这里，历史与现实相伴相生、呼应勾连，转接处妙趣横生，气韵贯通。如北宋熙宁二年城砖铸了字，开了天眼，开始与人与世界对话，母亲呼唤儿子回家吃晚饭的声音同时洞穿而来，少年的“我”心血来潮，与同窗秋游城墙，在同样燃着青春火焰的目光里，令孔宗翰烧造的城砖获得了二度诞生……多个时空的巧妙流转显示出作者驾驭文体的精到功夫，散文这个古老的文体就如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带领我们穿越古今，遨游真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在、宏阔、奇突与绚丽。

在朱强之前的散文《墟土》中，视觉、听觉、嗅觉同时打通，想象力加入其中，意象陡然鲜活，别开生面：“（挖土机）轻巧地就把千年的黑暗开启了，卡车载着一千多年的时光，绝尘而去……花香酒气、笙箫笙箫的年代，就这样被硬生生割开了”、“所有的事物都在泥土里真实着，簇新着。各个朝代的人物摩肩接踵，低声交谈，烧火，织布，写状纸，饮酒，耕作，书声琅琅”。

到了《行砖小史》，朱强诗意的语言不见斧凿之迹，更显自然畅达，并赋予了动感、哲思：“铭文被火凝固，被空气擦拭，露出娟秀、肥荡、内敛、高贵、张狂不羁的面孔。它们暴露在南方的光线里，神采奕奕。铭文让砖看见了世界，也让世界看见了砖”，“有许多力，她始终是看不见的，出生漫漫，需要不断地被力推，一下下地推，从北宋推到南宋然后一路推来……直到我妈将最后一个力作用到我身上，将我推向世界为止。那一刹那，我才终于见到了光，世界晶莹剔透地像颗紫晶葡萄，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美。我被放在了秤盘上，六斤六两，不知道这有没有一块砖重”

朱强的语言无疑是醒目的，他行文如诗如歌，富于古典韵味，善从世俗生活中发现美，既不类同于纳兰妙殊的日常叙事，也不似苏轼的浅吟细咏，又不同于陆蓓容的闲雅空阔……他的语言穿透古今，神思飞扬，经由它我们身心自在地摆脱日常，不仅在符号而且在意义层面抵达了连通感官和心灵的诗境，领略了地气氤氲却境界开阔的气象。

在语言和结构的独特血肉里，富于个性的哲思犹如灵魂闪烁光亮。这主要表现为作者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与把握。在《行砖小史》中，虽是小小城砖，却是圣土的延伸，在家园翻挖之后，不得不进行一场新的精神冒险。作者追寻其来龙去脉的过程，充满了对永恒世界与自我根蒂的探究。于是我们看到，在生死轮回、聚散不定中，旅行的城砖虽然微不足道，却成为一个奇特的支点，凝聚着古老文明，承载着作者希冀，犹如精神家园的永恒构件，即使坍塌屋倾、城破人灭，它依然会像血脉里的基因代代相传，永不磨灭，并会在下一场、下一场旅行里，成为修复者、重构者。

我相信「文字缝隙」

□龙一